

# 西方正统经济学: 时间规划与复杂问题<sup>[\*]</sup>

徐国松

(新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摘要]**复杂问题与时间建模深度关联, 成为经济研究绕不开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难题。时间要素特别是未来向度的引入, 使模型建构触及经济本体, 使以动态性、非线性、不确定性和不精确性为表征的复杂经济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西方正统经济学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积极进展, 其理论流变表明了这一点。祛除意识形态因素和辩护色彩, 其技术路径和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西方正统经济学; 时间规划; 复杂问题; 方法论

DOI: 10. 3969/j. issn. 1002 - 1698. 2021. 11. 017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 由于致力于祛除形而上学、不断被实证化和形式化, 西方正统经济学日益远离经济现实, 以致沦为“黑板经济学”和“数学游戏”, 对于现实中的复杂问题几无回应与关照。进入新世纪以来, 特别是 2008 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 这种认识得到进一步扩大与强化。对此, 需要理性对待。在复杂经济时代来临、全球经济高度融合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深度推进的背景下, 一方面需要对西方正统经济学固有的意识形态保持必要警惕, 另一方面需要借鉴其解决复杂经济问题的科学成分。自斯密以降的西方正统经济学家所建构的经济模型或

经济理论, 无疑是对西方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市场经济现实问题的理性折射和逻辑把握, 在试图解答相关复杂经济问题时总体上采取了一种“以一驭多”和“以静制动”的逻辑进路和思想传统, 侧重于强调理论的统一性和普遍性, 弱化了其差异性和特殊性, 既有致命缺陷也存在合理成分, 亟待深入研究和科学厘定。把握这一问题的根本与关键在于, 厘清西方正统经济学为因应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复杂问题所建立的经济时间模型及其理论内涵。本文通过梳理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流变, 致力于探析经济时间模型化的内在机理, 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

**作者简介:**徐国松, 法学博士, 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 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专题设计和题库建设研究”(2017JG054) 的阶段性成果。

提供方法论启示。

## 一、自然秩序论的出场与财富创造和分配问题照应

早在古典经济学中,时间作为建构理论的要素已经起着基础性作用,这与当时面临的现实复杂问题密切相关。斯密和李嘉图所处的时代正值资本主义生产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变革过程中,经济领域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为国民财富的创造与分配问题。为了破解这些矛盾和问题,他们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理论体系。在这些理论的建构中,引入了形式化时间即钟表时间作为基本参量,诸如劳动时间是衡量价值的尺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地租理论中的运用等等。不仅如此,古典经济学家为了使理论尽可能照应现实,在研究过程中积极运用动态分析方法,这一点可以从李嘉图和约·穆勒的分析中看得更清楚。对此,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分析指出,李嘉图“整个理论中大部分是动态经济理论。对他来说,主要动力是积累趋势。这可以把它与我们所说的储蓄等同看待,而且李嘉图也正确地把它当作一个动态概念来对待。”<sup>[1]</sup>在谈到穆勒的动态分析方法时,哈罗德评价说穆勒关于给“均衡理论再增加一个运动理论——给静态政治经济学再增加一个动态政治经济学”的阐述“简直说得再好不过了”。<sup>[2]</sup>

虽然古典经济学“大体上按同等的比例,包括……静态的和动态的成分”,<sup>[3]</sup>但古典经济学家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分析中采取了超历史的分析方法,在对具体经济现象和过程的微观分析中拒斥了实质性时间。这除了存在阶级的局限和意识形态辩护的因素以外,还受到牛顿绝对时间观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货币在商品交换中仅具有媒介功能,且商品交换过程是瞬时完成的,这种“瞬时”在理论上只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时间点。这种观点实质上体现了时间空间化的思想认识,最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集中体现

出来,直到牛顿时代,这种思维方式始终在西方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经济学上,近代可追溯到休谟的经济思想中,其交换中的“瞬时”完成思想在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巴德的著述中有所表述;后来,在萨伊的经济思想中更为明显,以致成为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观点;对此,马克思在1857年经济危机中就认识到这种观点的荒谬性。正是忽视了实质性时间在复杂经济现实中的具体作用和影响,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供给和需求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自由市场机制是完美的,以此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是“和谐”的,不会出现经济发展的“中断”和危机,因为在这种忽略过程的市场交换中一切都是顺利的,在作为和上帝一样发挥作用的“自然秩序”及其规律作用下,市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经济处于“永恒均衡”状态。这事实上把不确定性问题还原为确定性问题,很大程度上简约了现实,用一只“看不见的手”处理和应对所有经济现实复杂问题,因为在斯密看来“在一个无时间的最终均衡的世界里,显然是不存在任何变化或不确定问题的”。<sup>[4]</sup>这种经济时间观经边际革命数理形式的点化,一直延续并遗存于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的经济模型中。

## 二、微观—静态经济理论的创设与均衡价格问题解答

但是,19世纪后半叶随着边际概念和数学公式在新古典静态分析中的运用,动态经济分析却不见了。对此,哈罗德不无讽刺地说:“大概是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力理论在瓦尔拉、帕累托和马歇尔的大厦里已弄得很完善,引起了知识界的激动”。<sup>[5]</sup>然而,事实在于“动态经济学没有给边际分析提供这样的场所”。<sup>[6]</sup>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改变与当时经济理论侧重于研究流通中均衡价格的形成与实现直接相关。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马歇尔笃信“自然不能飞跃”,<sup>[7]</sup>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不会发生跳跃的连续的过程,经济均衡是常态。他认识到时间在经济理论

分析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时间因素是经济学上许多特大困难的根源”,<sup>[8]</sup>并把经济时间划分为瞬时、短期、长期和超长期四种,进而着重分析指出,时间长度短到“供给就局限于现有的存货”,<sup>[9]</sup>市场价格主要由需求决定,此时就取得了瞬间的或暂时的均衡。这一点和萨伊定律的相关分析一脉相承。难怪有评论说,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似天使在针尖上跳舞。哈罗德将这种静态分析指认为“本质上是和休止状态有关”,在“可得到的生产资源的整个范围既定、技术状况既定,以及一个社会中个人的欲望和嗜好都既定”<sup>[10]</sup>的一系列假设下,市场建立了均衡状态。哈罗德进一步分析说,这种分析是“把自己建立在一种可以称为‘原子’假设的东西上面的,即每一个生产者都只是整个经济中很小的一部分,以致他自己的产出量的变化对于他的产品的价格毫无影响。这就使得:就他而言,他所碰到的是一条具有无限弹性的需求曲线。”他认为,这里“隐伏着”由斯拉法所揭示出的矛盾,即“在这种情形下,在均衡点上不可能出现生产费用递减的条件。因为要获得这种条件,就必须存在某种程度垄断性”。<sup>[11]</sup>

可以看出,囿于机械论和绝对时间观的视界和局限,马歇尔为了解决充分竞争条件下的均衡价格问题,经济分析同样采用了还原与简化方法,即在分析一个经济变量时,把其他要素强行塞进一个他称之为“其他情况不变”的“待用包”之中,它们的扰动效应暂时忽略不计。马歇尔虽然认识到经济时间与达尔文提示的生物时间相近、与伦敦议会大厦上的“大本钟”的物理时间不同,但当他试图解决特殊经济问题时立刻感觉到时间是“那些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他提出,面对复杂的经济现实问题“人类有必要利用他有限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前进;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一次只研究一小部分,最后将这些局部的答案整合起来,便构成了解决整个费解问题的一个或多或少完全的答案。”<sup>[12]</sup>在马歇尔经济理论中,时间仅是时钟时间,是可逆的和抽象的,所关

注的仅仅是生产函数在短期和长期的表现。这里清楚地显示出,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是如何把真实时间挤出经济模型的。为了弥补马歇尔理论的不足,虽然后来约·贝·克拉克对其厂商理论进行了改造、琼·罗宾逊和爱·H. 钱柏林对其“完全竞争”理论进行了改造,但这些经济学家包括早期琼·罗宾逊仍继续延用了相关的假设与方法,正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多德所指出的,这里“所有人都是理性的,没有时间,没有变化,除了假想的人类和市场关系外,一无所有。”<sup>[13]</sup>

由于本质上抽象掉了时间因素,被哈罗德称为微观—静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虽然一定程度上涉及蛛网作用可能性问题、多重均衡可能性问题以及不定性区域问题等,但仅适用于具有完全竞争特征的经济环境,即“某个鲁宾逊式的人物”和“自耕农”所在的“相当原始的社会”环境,<sup>[14]</sup>应对19世纪末由垄断等因素引致的复杂经济现实问题的视野与方法亟待拓宽与调整。

### 三、经济预期的引入与宏观动态问题探索

对于这种边际革命以来逐步形成的新古典经济模型的内在缺陷,瑞典学派根据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经济分析模型中引入经济预期等时间变量,尝试从宏观动态层面予以反思和改进。受古典货币数量论、边际效用价值论、迂回生产资本论和时差利息论的启发,魏克赛尔在《利息与价格》一书中提出了所谓累积过程论。在方法论上,虽然沿用了均衡分析法,其货币均衡分析却与以萨伊法则为基础的瓦尔拉的一般均衡分析不同。他认为,现代信用制度下商品价格的调节因素不能简单地归约为硬币、纸币的货币数量,信用票据的作用不可忽视;在现代信用和银行制度下,货币流通速度具有较大弹性;边际效用概念对于货币价格水平的分析失效,货币价格不受商品市场或货物生产本身的控制,其支配原因要到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关系中去寻找。这种分析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经济

本体层面的实质时间,正如米尔达尔所说,“魏克赛尔已把货币理论的主要着重点,由旧数量说中支付机构的肤浅水平转移到价格形成本体的较深刻的水平上去了。”<sup>[15]</sup>在理论内容上,魏克赛尔进一步提出了货币均衡的实现条件,即资本自然利率等于贷款利率。从解释“当价格上涨时极少见到利率下降或趋向下降,最常见的倒是利率提高或趋向提高,而价格跌落时利率则跟着下降”<sup>[16]</sup>这一实际经济现象出发,撇开货币、信用等经济介质,提出“资本的自然利率”概念,以“获得一个比较确切、虽然还是有些抽象的标准”,将其“当作一个货币与价格的完整理论的基础”,<sup>[17]</sup>对自然利率与贷款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探讨。他运用由贝努利法则推演出的机遇法的理论,认定自然利率的量将随着“生产的效率、固定和流动资本的现有量以及劳动和土地的供给”这些“一个社会当前经济情况那些数不清的事物”的不断变动而“持续的、不间断的”变动,但货币利率的提高或降低则由于“大金融机构支配”而大多是“不连续的、突跃的”。<sup>[18]</sup>这样,在货币制度运作的实际情况下,“贷款利率迟早是要向当前的资本的自然利率水平看齐的”,<sup>[19]</sup>而一旦“这两个利率趋于一致时,商品价格水平将保持不变”,<sup>[20]</sup>于是经济呈现均衡状态。魏克赛尔进一步认定,这种由利息率变动引致的物价波动过程具有累积的性质,由于存在着利息率这一制动器,这种累积过程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从对魏克赛尔累积过程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其理论功能是服务于垄断资产阶级的,但首次从理论上动摇了萨伊法则,破除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动均衡的陈腐教条,倡导了通过利息率调节经济的宏观货币政策,为建立宏观动态均衡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凯恩斯主义的先驱,也为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复杂经济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的和方法的启示,这与其理论分析深入经济本体、<sup>[21]</sup>触及实质时间密切相关。

魏克赛尔开启的宏观动态均衡学说及其分

析方法沉寂 20 多年之后,在米尔达尔和林达尔等瑞典经济学家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米尔达尔在其著作《价格形成问题与变动因素》中,强调企业家的未来预期以及不确定和风险等因素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对传统静态均衡价格理论进行了改进。在《货币均衡论》一书中,他首先对魏克赛尔的货币理论作了辩证的评价:一方面指出其局限性,认为它“主要是在一个封闭经济中才是真实的;只有当商业循环的各种情况在世界各个部分同时发生时,它才能直接用来对世界经济作一般的分析”,并指出这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在世界大战以前事实上或许是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又指出其合理性,认为“它是一个很正式的理论,因此不是以很粗略的近似数值为基础的……这些粗略的近似数值在观念上是必需的,不能放弃,因此它们堵塞通向更加现实的分析的道路。”<sup>[22]</sup>其次,他指出了传统时点分析的局限。认为这种分析“把变动隐藏在没有时间性的时期分界点上,事实上动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而且,“为了能够将变动关闭在一个没有时间性的顷刻上,就必做那种‘绝对可动性’的可疑的旧假设。但此时便很难看出为什么这个过程不立即发展到它的终结”,这样,“变动的发生和没有时间性的点这一观念是矛盾的”。为此,他提出:“在一个时点上只能有趋势,这个趋势能够而且必须作为动态分析本身的准备步骤来加以研究,动态分析本身是涉及所研究的次一时点以前在时间上的因果发展的。”<sup>[23]</sup>进而,他把诸如资本价值、所得、储蓄、投资等经济变量区分为事前估计与事后计算,把预测的方法与回顾的方法区分开来,用可观察的和可测的量来说明均衡的条件,分别基于对实际资本的收益率、储蓄与投资、价格水平的深入分析,从动态和不确定性的角度重新解释了魏克赛尔货币均衡得以实现的条件。其间,强调了资本家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主观心理预期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从理论体系看,米尔达尔是反对均衡分析的,所以进一步关注并发展了魏克赛尔的累积

经济过程论,强调累积的因果关系分析。与着力于稳定均衡的单向性因果关系分析不同,累积的因果关系分析内蕴着多变量的正负反馈机制,关注变量间的相互影响,着力于阐明经济系统的非均衡态。

为了积极应对19世纪20—30年代日益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受魏克赛尔累积过程论和米尔达尔预期理论的影响,林达尔致力于进一步改进累积过程论,建立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更为“接近”的动态经济模型。林达尔在其论文《资本在物价理论中的地位》中,试图借助于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论和时差利息论改造瓦尔拉、卡塞尔的资本理论,通过引入投资期间概念,力图把庞巴维克和魏克赛尔的资本和利率理论纳入一般均衡价格理论体系之中,进而实现“把瓦尔拉、卡塞尔的价格决定学说和庞巴维克、魏克赛尔的资本理论熔为一炉”<sup>[24]</sup>的目的。在林达尔看来,为了使研究更接近于经济现实,必须使用人们对将来看法的“具有盖然性性质”的假设代替“准确地预测将来发展的假设”;制约发展或然性的因素主要是“判断力”“情感”及“危险性的估计”三个因素,它们相互联系,形成“企业家根据他们实际上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对危险所作的冷静估计”即所谓“客观危险”。要回答这种“更复杂的假设”下的物价决定问题,只能使用“一系列代表着米尔达尔所说的特殊‘复杂’情况即静态经济制度包含有动态因素的联立方程式来作说明”。然而,他进一步分析指出,这种分析仍然是传统的静态均衡方法,需要通过将“总数量的函数”改为“个别函数”,才能“使方程式变得更复杂”,使分析更能体现“纯粹动态问题的特征”,正如他所说:“引进危险因素,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像从前那样,使用那些表示总数量的函数来作说明,而必须使用个别函数来作说明,因为纯粹动态问题的特征乃是各人各有不同特点。人们的预测具有不同程度的或然性,这也使方程式变得更复杂。”<sup>[25]</sup>林达尔在其著作《利息率和物价水平》中,为了修正魏克赛尔的物价

累积变动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物价水平变动的基本方程式:“ $E(1-S) = PQ$ 。在这数式里, $E$ 代表名义总收入, $S$ 代表这总收入中储蓄起来的部分, $P$ 代表消费品的价格水平,而 $Q$ 代表一定时期中这种货物的数量”<sup>[26]</sup>在这里,他强调了“利息率水平”和“预期”对价格水平的决定作用,正如他所分析指出的,“消费资料价格水平,一方面主要是由消费和储蓄的关系来决定,另一方面是由消费资料产量和生产资料产量的关系来决定。这些关系本身又决定于利息率水平和人们对将来的期望”<sup>[27]</sup>在《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一书的首篇《动态理论研究》中,林达尔把经济理论的动态研究方法区分为把动态过程视为由一系列短期暂时均衡组成的传统均衡方法和分析连续的各时期经济变动过程的不均衡方法,并认为后一种方法较第一种方法优越,因为利用这种分析方法更能使理论接近于经济现实。他所谓不均衡方法,是借助于事前估计和事后计算概念,建立动态序列经济模型,其理论基础是理论假设、经济计划论和经济发展论。他分析说:“要构想一个经济过程,必须从研究经济人计划的性质出发,这个研究又必须根据假设。这些假设有的是关于技术,有的是关于制度,有的是关于心理,但都必须尽可能接近现实”<sup>[28]</sup>为此,他首先对一些基本概念力求作出概括的、扼要的说明,使这些概念可直接适用于实际情况,其次进一步对这些概念的关系作出系统的说明,之后才能“从一般的说法进到比较特殊、比较复杂的说法”<sup>[29]</sup>这样,林达尔就建立起了动态分析的期间分析法或序列分析法,超越了传统的均衡分析法。

#### 四、未来视角的强调与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求解

在由经济大萧条引致的对新古典经济理论进行的反思过程中,凯恩斯受到包括瑞典学派宏观动态均衡学说在内的既有成果的启发和影响,在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构建中更加重视时间变量的引入。他首先分析指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在经济时间问题上的不足,认为它企图通过

抽象掉人们对未来知之极少这一事实来处理现实问题。为了克服这一缺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自己的经济时间模型。研究表明,在凯恩斯解释产生经济危机的模型中存在着这样的思路:经济危机和非自愿性失业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致,有效需求不足又由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造成,支配消费和投资活动的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流动性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三大心理规律,而它们是基于未来不确定性的理论概括。具体而言,他认为人们将为未来的不确定而储蓄,宁可牺牲一些利益愿意持有现金是因为对有关将来的预测和常规不信任;由于人们据以推测未来收益的知识极其有限而使投资决策的信心受到影响。可见,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模型中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历史本体时间,认识到不确定性不可预知,看到了“预期”是联结现在和未来的纽带以及决定经济波动与否的经济运行态势的控制阀,强调了诸如“冲动”“热情”和“恐慌”等非理性因素在不确定性经济环境中对投资变动的决定性作用,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持有的“静态社会”的经济时间观,对解决现实问题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所以,在学者戴维森看来,《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核心思想是,分析在一个不确定性不能用概率加以计算的不确定的社会中,预期的形成和影响行为的方式。<sup>[30]</sup>但是,由于凯恩斯过于强调主观心理因素的作用,且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迷信,使他的经济时间思想拖着庸人的尾巴,在理论结论上仍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硬核予以保留,所以他说:“我们对古典学派经济学理论的批评,主要不是发现了在它的分析中有什么逻辑错误……实行了国家管理,能够确立一个与充分就业相适应,近乎可实现的总产量,那么从这一点以后,古典学派的理论还是可用的。”<sup>[31]</sup>

凯恩斯主义的拥趸、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对诸如货币理论、资产选择理论、流动性偏好、动态均衡等方面进行时间分析中,对凯恩斯的经济时间模型进行了所谓的补苴罅漏。为了建立动

态经济理论,他提出了星期、计划和肯定的预期三个概念,断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具有暂时均衡和长期不均衡的运行特征,并分析指出导致长期不均衡的主要因素是个人价格预期不一、买卖双方计划不一、由技术或心理因素引致的完全预见缺乏以及偶然因素等等。以此为基础,将其“静态均衡分析法”运用于处理动态问题。他在分析资本选择问题时指出:“即使是考虑到凯恩斯的 $M_2$ ,我现在还是会抛弃简单的有价证券方法。因为,它对时间因素注意不够。”<sup>[32]</sup>并进一步分析指出:“灵活性的性质不是单项选择,它是一个选择的序列,一个相关的序列。它涉及到的是从已知到不知的转移——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等待,我们就能获得更多的知识。”<sup>[33]</sup>在分析流动性偏好和均衡问题时,希克斯在IS—LM分析中强调了特别短期“星期”以区别于凯恩斯的“年度”短期;认为IS作为流量与“时期”有关,LM作为存量与“时点”相关,流量和存量均衡之所以能够合适地并存是因为存量的均衡是一个过程,时间上的均衡意味着在时期内预期和实现的一致性。当他在这里发现预期、流动性偏好以及均衡出现了矛盾时,为给流动性偏好留下余地,就在其论著《经济学的因果联系》中设想为预期值设定一个特定区间。尽管希克斯试图在经济时间问题方面一定程度上对凯恩斯的思想有所改进,并注意从历史视角分析经济问题,但由于没有考察经济发展动力问题,在处理经济问题时仍以均衡思想为主导性思想,只是将一个个“暂时均衡”连接为成串的“均衡移动过程”。这就为他幻想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均衡移动”状态提供了意识形态辩护。在理论分析中由于过于强调未来的不确定性,他进而反对进化论的思想。此外,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其动态经济分析存在两个限制条件:一是完全竞争假定,“忽略对供给的影响,这种影响来自卖主对于影响他们自己进行销售的价格因素之种种考虑(对需求也是同样的)”,因为“要充分估量到这种影响是很困难的”;二

是逻辑分析仅限于“私有企业经济体系”，“丝毫不包括机构的控制因素在内”。<sup>[34]</sup>这些思想认识局限和逻辑分析限制，无疑决定了希克斯的动态经济分析影响力的有限性。

### 五、动态系统的数理阐释与不确定性问题探讨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后，西方正统经济学对复杂问题和经济时间的认识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古典综合派那里，重要代表有萨缪尔森、托宾等经济学家。尽管萨缪尔森在作为新古典综合派的核心理论即收入决定理论中注意到投资的不稳定性，但是由于投资成本即利率函数，与收入、储蓄之间的关系是确定性的，未来、预期、不确定性等因素被排除出了宏观投资总量系统，预期也就不存在了，这一理论就具有了瓦尔拉一般均衡论的色彩。但是，萨缪尔森在高度评价了凯恩斯在宏观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的基础上，对于新古典综合派经济理论中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精确性因素进行了强调。他认为，凯恩斯“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经济随着时间过程而演变的这一全新观念，从而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时代”。<sup>[35]</sup>在回答人们为什么在对于乘数问题的认识出现分歧时萨缪尔森分析说，根本原因在于现实经济关系自身具有不确定性，在对待这些复杂关系时经济学家持有不同的意见，因此和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中包含着更多的内在的不确定性。他进一步分析指出，既然现实经济运行具有不确定性，人们所把握的经济关系不是完全准确的，那么经济规律也就只是概率规律，通过平均数规律发挥中介作用，从总体发展趋势看，社会经济发展和总体行为仍有规律可循。在论述投资过程充满不确定性时说，由于投资决策“所依赖的未来事件非常难以预测”，<sup>[36]</sup>所以投资是“极端变幻莫测的”。<sup>[37]</sup>在分析社会消费函数时他指出了经济学不如自然科学那样精确，他说：“经济学中充满了近似和不完全的理论……总是存在着我们忽略了的其他影响因素……同样重要的是，消费者随时间发展而不断改变其消费方

式的讨人嫌的倾向。”<sup>[38]</sup>正是由于变幻不定的投资在加速原理和乘数原理的作用下，经济经常出现周期性波动，而经济周期不是机械地重复过去，尽管知识的积累利于经济预测，但利用经济周期对经济进行预测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在阐明动态经济学的动态分析及其与比较静态分析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他明确指出：经济动态系统就是由实质上含有不同时刻变化的函数方程（组）决定的经济行为系统；通过动态分析描述经济体系在时间中变动调整的过程，可以找出稳定均衡的条件，从而把动态分析方法与静态分析方法统一起来。在谈到经济控制和经济危机的关系时，他认为随着人们关于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的知识的不断累积，曾经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经济造成很大伤害的“狂烈的经济周期已经被制服，不过它还不是一条叭儿狗”。<sup>[39]</sup>从我们对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时间思想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一学派虽然囿于阶级局限作出的诸多结论是不科学的，但关于复杂问题和时间的探讨中也有一些内容和方法值得引起重视。

为了使凯恩斯投机性货币需求理论更接近于现实，托宾创立了资产组合理论，阐述了人们在未来不确定条件下如何通过合理安排资产组合以减少投资风险问题。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中假设存在一个多数投资者承认的“正常利率”，并通过将这一利率与市场利率大小的比较分析，阐明投资者如何在现金与债券之间进行选择以及“流动性陷阱”问题。托宾认为，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所谓多数投资者认可的正常利率是不存在的。接着，他对资产进行了分类，分析指出了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在现实经济运作中具有不同的特性差异；依据对待风险的态度不同将投资选择进行了分类，指出实际生活中的风险回避者和爱好者居少数，风险中立者居多数。在此基础上，他通过引入实质时间分析指出：随着资产收益的增加，其正效用逐渐递减；随着风险增加，其负效用逐渐增加。进而，他运用

这一思想具体解释现实经济运行过程,指出投资者因时顺势调整握有的现金和债券的比例大小。最后得出“预期的资本价值损益总是等于零”这一复杂经济环境中资产最优组合原则。此外,托宾还运用资产组合理论分析了经济现实中实物市场和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不仅拓展了包括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一般均衡模型,而且借助于“q 值理论”阐述了资本存量和流量的相对价格关系,分析指出资本存量价值对商品市场中流量的供求依赖和金融市场的资产选择依赖的复杂关系。

## 六、未来不确定性思想的重申与经济 动力学内核确认

以琼·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为了应对复杂经济现实问题,致力于在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之间寻求建立垄断竞争模型。为了因应现实经济中出现的垄断问题,罗宾逊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买方垄断模型,用于分析产品市场和资源市场的买方垄断及其均衡实现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剥削问题。虽然这些研究尤其是买方垄断模型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瓦格纳法案、罗宾逊-帕特曼法案和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等,但囿于静态均衡分析的传统,经济建模中“没有涉及时间因素”<sup>[40]</sup>以及理论假设“绝不是分析在现实中出现的价格、生产和分配问题的一个合适的基础”,<sup>[41]</sup>所以后来她对此进行了自我批判,并致力于“转而探索其他一些经济领域,以努力发展一种对经济世界更动态、更现实的分析。”<sup>[42]</sup>

促使她理论上进行反思和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对触及本体的经济时间思想及其模型化的深度认识。在经济时间观上首先使她关注未来因素的是马歇尔,因为在她看来,马歇尔“不经意地指出,当信心不足、投资减少、市场一个一个相继收缩时,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就失效了。”<sup>[43]</sup>这使她从中洞察到经济预期的模型化对于打破新古典均衡模型分析框架别具意义。当

然,除马克思及其经济时间思想之外,真正促使罗宾逊重新关注未来不确定性问题、使其经济理论由均衡观转向历史观的是凯恩斯及其经济时间模型。在她看来,凯恩斯革命“在于从均衡观转向历史观,在于从理性选择原理转向推测或传统基础上的决策问题”,<sup>[44]</sup>其经济思想的实质是在其经济模型中引入了未来时间因素,承认了未来不可知和现实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并在此基础上超越了正统派以超时间的均衡概念为基础的理论体系。正如她所分析指出的,正统派体系的根本谬误在于相信市场经济总是倾向于达到均衡,就像左右摇摆的摆锤总是接近于静止状态一样。这个类比是错误的。一种空间运动可以来回往复,然而通过时间的运动则只能是单向的,从过去到将来的。人类生活势必在没有“正确预见”的情况下度过。她进而分析说:“《通论》的主要论点是打破均衡的束缚,并考虑现实生活的特性——昨天和明天的区别。就这个世界和现在说来,过去是不能召回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sup>[45]</sup>她认识到,一旦承认现实经济是从过去向未来前进的,以钟摆隐喻为基础的均衡观就站不住脚了,通过概率计算法使不确定性像确定性一样可以计算的传统教义就破产了。

罗宾逊从新经济时间观和不确定性思想出发,在分析批判传统动态均衡经济学局限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了动态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她认为,传统动态均衡分析仅仅满足于动态分析,由于其所谓动力只是存在于虚构的原理和假想的数学方程中,所以是荒谬的。她首先指出了动态经济分析的特点。她认为,动态经济分析一旦离开过去的历史,就无法解释特定条件下的行为,它是将建立在空间运动上的隐喻运用到时间过程中。原因在于,在空间中,有可能前进、后退、修正方向错误,而在时间上,对每一天来说,过去都是无可更改的,未来也总是未知的。<sup>[46]</sup>其次分析指出,因为投资对经济变动情况的延迟反应将引致经济体的动荡,所以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及其影响构成经济动态学的核心。在她看



来,动态经济学的真正动力源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经济现实,这使其经济时间模型与现实问题更加切近。虽然罗宾逊的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仍具有特定的历史和阶级局限,但其在经济时间模型化方面超越了传统经济学。

## 七、时间模型化的方法论启示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

时间因素在西方正统经济学处理复杂经济问题中若隐若现却贯穿始终,其模型化对于批判、建构以及预测等理论功能的彰显与发挥着关键与核心作用。检视和阐述西方正统经济学时间视阈中复杂问题的思想流变,对于客观评介和科学对待西方正统经济学、从中汲取相关技术思想与方法,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启示。

在经济问题分析中需要确立复杂性观念。现代经济分析所面临的经济环境与问题无疑是复杂的。这正如美国学者杜威所说,现实是复杂的,“不确定性本来是一件实事”。<sup>[47]</sup>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变革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爆发,国际经济分工与协作呈现出新局面,加之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浪潮的侵袭,复杂经济时代扑面而来。相应地,经济研究与分析也面临着诸如工业4.0转型中的车间革命、劳资矛盾激化、政府与市场关系凸现、贫富分化加剧、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信用危机等一系列复杂的现实经济问题。此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还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优化、市场体系完善和法规健全、供需结构和总量再平衡、国际贸易结构和导向调整等一系列复杂环境与问题。在此背景下,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突破口和着力点,是破解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要义和钥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正视和研究这些复杂现实问题、确立复杂性思想观念。

在经济理论建设中需要本体论自觉。这里所谓本体论自觉,主要是指要客观真实地考察与分析复杂经济问题,就需要把研究对象置于其所在的特定经济环境中动态地把握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过程,以凸显经济理论研究的本真性、整体性或总体性。质言之,本体论的立场与分析也就是基于未来的立场与分析;正是面向未来,经济行为和现象才呈现出诸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本体论自觉是经济理论建构的前提和基础,这一点从瑞典学派、凯恩斯主义以及新剑桥学派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看得很清楚。显然,在这种经济分析视界中,非均衡是常态,均衡属偶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基恩说:“如果经济学应该与真实世界具有完全的相关性——如果经济学更应该与真实经济保持内在的一致性——那么,经济学必须以一种不能假定为均衡的方法来系统表述。经济分析必须最终呈现出一种时间或动态分析的局面。”<sup>[48]</sup>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本体论是其理性之根和立论之基,需要足够的理论自觉。

在经济模型建构中需要时间规划。复杂经济现实问题的合理解决离不开对时间要素的科学处理,因为时间是接近复杂经济现实的唯一途径,正如基恩所说,经济学“最终必须认真对待时间问题”。<sup>[49]</sup>从对西方正统经济学时间视域中复杂经济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中不难看出,经济理论的重要进展和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无不与时间模型化的合理方式紧密相关。西方正统经济学应对复杂问题时,时间模型化的方式主要有“无时间因素模型”和“显性时间模型”、个别行业的时间模型和整体经济的时间模型、<sup>[50]</sup>短期模型和长期模型、动态均衡模型和动态非均衡模型等。其突出特点是,对形式逻辑中的形式化时间十分重视且日益精致,而对辩证逻辑中的实质性时间重视不够且有淡化趋势。这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崇尚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和历史主义不无关系。相应地,西方正统经济学在应对复杂经济现实问题时,手法上长于使用

抽象与还原方法,策略上惯于采取“以一驭多”和“以静制动”的思维路径。这一点即使在凯恩斯那里表现还是比较突出的,他曾分析指出:“经济学是一门以模型思考的科学,又是一门选择与当前世界相适应的模型的艺术……模型的目的在于把那些近似不变或相对恒定的因素同那些暂时的或波动性的因素分离开来,以便发展出一套逻辑思维方式来分析后者,并理解它们在特定情形下所导致的时间序列。”<sup>[51]</sup>当然,科学地抽象与还原是必要的,但如果超过必要的限度乃至模式化和程式化就不可取,因为这样做往往会使“完善的科学就退化为微分方程的研究”,进而引致“具体的世界从科学的网眼中漏过去了”。<sup>[52]</sup>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既需要注意克服西方正统经济学处理时间变量过程中的缺陷与不足,也需要积极借鉴其中的科学技巧与方法。

### 注释:

[1][2][3][5][6][10][11][14][英]罗伊·福布斯·哈罗德:《动态经济学》,黄范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7、19、16、20、16、5、7、10-11页。

[4][美]默瑞·N.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张凤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91页。

[7][12][美]托德·G.巴克霍尔兹:《已故西方经济学家思想的新解读——现代经济思想导论》,杜丽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2、147页。

[8][9][英]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廉运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93、274页。

[13][美]道格拉斯·多德:《资本主义经济学批评史》,熊婴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

[15][22][23][瑞典]米尔达尔:《货币均衡论》,钟淦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6、186-187、44页。

[16][17][18][19][20][瑞典]魏克赛尔:《利息与价格》,蔡受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1、18、102、19、13页。

[21]关于这一点,经验主义者威格曼于1928年在其《商业学说》一书中曾提出质疑,认为“(贷款)利率必须和资本的‘自然利率’一致,总是纯形而上学的”。对于威格曼的这一评论,米尔达尔承认“在客观上威格曼完全正确。魏克赛尔的‘自然率’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但他同时指出:“‘事实’绝不是容易解释清楚的东西,特别是当它们是属于很一般和很复杂的性

质的时候。在每一‘事实’说明的后面是广阔的理论上的假设,威格曼可能是忽略了这种假设的存在”,况且,“魏克赛尔思想线索……不仅对于解释‘经验上建立的事实’而且对于观察它们都是有用的”。参见[瑞典]米尔达尔:《货币均衡论》,钟淦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7页。

[24][25][26][27][28][29][瑞典]林达尔:《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陈福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272-273、109-110、3-4、21、4页。

[30]Davidson, P., *Money and the Real World*, London: Macmillan, 1972, p. 97.

[3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宋韵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90页。

[32][英]希克斯:《经济学展望——再论货币与增长论文集》,余皖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0页。

[33][英]希克斯:《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杨志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1页。

[34][英]希克斯:《价值与资本》,薛蕃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8页。

[35][36][37][38][39][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240、221、227、218、330页。

[40][41]Robinson, Joan., *Imperfect Competition Revisited*, *Economic Journal*, 1953, Vol. 63, pp. 590, 579.

[42][美]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经济思想史》(第7版),邱晓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8页。

[43][44][英]琼·罗宾逊编:《凯恩斯以后》,林敬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6页。

[45][英]琼·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5页。

[46]Robinson, Joan., *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acmillan, 1952, p. 3.

[47][美]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4页。

[48][49][澳]斯蒂夫·基恩:《经济学辨析——社会科学的一袭皇帝新衣》,霍彦立、王艳萍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第169、158页。

[50][美]彼得·戴蒙德:《时间:均衡模型讲义》,朱保华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页。

[5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经济学模型的构建和计量经济学》,[美]丹尼尔·豪斯曼主编:《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3页。

[52][美]怀特海:《思维方式》,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8页。

[责任编辑:刘毅]